

目 录

沦陷时期的湖北省汉奸组织·····	张范民 (1)
武汉汪伪特务组织的演变和灭亡·····	张孟青 (25)
武汉沦陷时期的日寇宪兵队·····	张维清 (52)
武汉沦陷时期的一个特殊反动机构·····	秦特征 (64)
日伪武汉军警训练亲历记·····	周金山 (70)
日伪武汉戒烟局的黑幕·····	夏国尧 黄少吟 (76)
十年流离的第十一兵工厂·····	谭文辉 (83)
抗战胜利后的军统武汉办事处·····	鲍志鸿 (90)
国民党国大会议纪实·····	胡楚藩 (107)
武汉园林风景线的形成和发展·····	余开来 (119)
谈谈我办的四份报和武汉旧新闻界·····	答恕之 (141)
在缝隙中生存的汉口《正义报》·····	魏予珍 (158)
汉口市银行纪要·····	张友三 (165)
武汉最早的华商照相馆——显真楼·····	严熙开 (174)
武昌鱼与武昌酒楼·····	袁复心 (177)
武汉的汾酒糟坊·····	胡之锡 (182)
旧社会鸦片烟业在汉口·····	田梅村 (186)
补遗：有关《民众乐园的前身——新市场》的资料辑录·····	陈辉汉 (89)
附：《武汉文史资料》第1至7辑总目录·····	(191)

沦陷时期的湖北省汉奸组织

张 范 民

日伪湖北省政府成立以前的何佩瑒 日伪湖北省政府的成立 汪记接管
湖北日伪省府 杨揆一的大杂烩 杨揆一卖官鬻爵 杨揆一同陈维政的勾搭
叶蓬的收场戏

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时起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止，七年之中，在日本侵略军的直接提线之下，以武汉为中心袍笏登场的汉奸政权，前后换了三套人马：第一期是以计国桢为首的反动商人地主组织的“武汉治安维持会”，第二期是由北洋军阀余孽和反动政客成立的日伪省、市政府，其中又可分为以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第十三子张仁黻为首的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系统，和以军阀时期曾任湖北省省长何佩瑒为首的日伪湖北省政府系统；第三期就由汪伪国民党亲自出马，先后派来了杨揆一和叶蓬作垂死挣扎，直到土崩瓦解为止。本文着重叙述二、三两期日伪省政府部分，对于日伪市政府方面，仅就与省发生关连者略加涉及。

日伪湖北省政府成立以前的何佩瑒

何佩瑒是湖北建始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据他后来自称是日军中将坂垣征四郎的同期生。在1920年前后，曾在北洋军阀湖北督军王占元属下充当参谋长，受到王的赏识，让他当了幕僚式的湖北省长。从王占元下台以后，他也默默无闻地做了二十

年的汉上寓公（他的寓所就在汉口黄兴路，当时属于法租界）。随着维持会这一短期过渡形式的临近结束，他也跃跃欲试，和他的儿女亲家石星川一起参加傀儡人选的角逐。石星川也是留日士官生，湖北阳新人，辛亥革命以后湖北新军受到北洋系的排挤而趋于消灭，但石星川仍得黎元洪授以将军府将军的空衔。湖北这类将军很多，人称“将军团”，他们凭籍这一头衔，插手一些地方企业，贪图享受，直到北伐以后，才消声匿迹。何、石两人的斗争，何较占优势，因为石很庸懦，何则狡猾得多。

可是，当时的日本侵略军还不想把赌注下在这两个昏庸老朽身上，宁愿从北方找一个老牌汉奸，曾在冀东伪政权里充当过县长的张仁蠡来充任首任的日伪武汉特别市市长。张是当时伪满大臣张燕卿之弟，是日寇信赖的人，年龄较何、石两人都小，他的父亲张之洞清末任湖广总督多年，在武汉推行过新政，兴办过一些官营企业，是一个和武汉有关系的有名人物。张凭藉这种簪缨世族的声势，何佩瑑、石星川之流也小看他不得。结果在日伪市政府的整个建制里，设置了一个非驴非马，无权无责，但体制似乎很高，薪水着实不小的所谓“参议府”，何取得了议长一席，石也成为副议长。事实上这个参议府奠定了何佩瑑个人下一步卖身投靠的起点。

何佩瑑在担任参议府议长这个大而无当的名义时，就着力进行两步工作，首先由他提名网罗了一批地方上著名的老政客和土豪劣绅充当参议府的参议。这些人大部分是湖北人，但也还包括少数的湖南人和江西人（如谭道南等）。这时江西方面九江和南昌已经沦陷，南浔铁路沿线有几个县的县城也被占了，湖南方面临湘、华容、南县，也成为日寇出出进进之地。何在参议府里收容了这两省的土劣，就是投合日本军方的意向，表示他对于华中三省收拾局势的能力。

其次，何还看中了一点，日军占领汉口以后，一方面固然还

在继续和蒋介石作和谈的试探，但另一方面在沦陷区内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为了抵销国民党的势力，日本军人曾经想尽方法，搞一些党派组织。武汉地区也曾搞一个小型的似乎是群众组织一类的东西，如“东亚青年联盟”等。可是这些组织号召力太小，在政治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要想另起炉灶地像华北搞一个“新民会”，一时还凑不起这一副班子。何佩瑑于是向日军献策，要重建所谓的“共和党”。原来袁世凯任大总统初期，两湖方面曾经以当时湖北省议会议长汤化龙等人为核心，拥戴所谓首义元勋副总统黎元洪为首领建立了一个名叫“共和党”的政党，尽管“共和党”并不反袁，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不久就瓦解了。何佩瑑当时在“共和党”里只不过是二流人物，可是现在他却想出借尸还魂的妙着。这计划也得到华中方面日军的赞许。当时华中方面日本军还须听命于南京方面的司令部，这计划送到南京以后，南京日军考虑到对国民党的和谈关系，主张慎重，因此只允许何佩瑑秘密地进行筹备工作，何也在“共和党”问题上向日寇的特务部要了一笔筹备费。这笔款项的来源就是汪伪中央未接管以前武汉方面关于食盐和鸦片专卖收入的结存。这笔款项当然主要由日军方面攫取，但何佩瑑和日伪市长张仁蠡也以各种名目进行分赃。

何佩瑑这些作法，投合了日本侵略者的意图，日方就决定了省市分治计划，在特别市政府之外，另设一个湖北省政府，让何佩瑑一试身手。

日伪湖北省政府的成立

1939年末，何佩瑑就把参议府议长让给他的儿女亲家石星川，而自己就袍笏登场，奔向武昌，就任日伪湖北省长。旧式官场通例，主官上任之日，一定要出一张红色告示说明“奉……令”或“经……推选”，这样才能表明权力从那里得来。他这个省长，既没有上一级的中央政权“特任”一下，又不便说明是由日本人委派，

也不好像张仁蠡一样找一些流氓地痞当场拥戴一番，这红告上如何才能“奉天承运”呢？何想到这一问题很费踌躇，还是由内定日伪省政府秘书处秘书主任贺遐昌替他解决了这个难题，贺建议采用辛亥革命时某些地方宣布独立时，都督所出红告的办法，直接用“本省长于某月某日就任”。这样，日伪湖北省政府就产生了。

何的日伪省府的全班人马是秘书长张若柏（原参议府秘书长）、民政厅长汪沅（老官僚）、财政厅长刘泥清（原日伪特别市政府税捐总署署长）、建设厅长宋怀远（何的日文翻译，原来是平汉铁路局职员）、教育厅长徐慎五（某日本洋行的职员）、警务处长王寿山（抗战前汉口特二区警察署署长）、保安处长孙基昌（北洋军阀的余孽），以后又加添宣传处（处长吕东荃原在河南任伪职）、社会运动委员会（由国民党人刘某任主任委员）。日伪省政府设在武昌，因此武昌就在事实上从武汉特别市的范围划归省府管辖，因而武昌公安局（局长陈宝方）和水上公安局（局长姜质生，姜因是张仁蠡一派，不久去职，由船舶管理局局长李志三接任，船管局也合并于水警局），也都移转管辖了。原辖市政府的伪法院系统，以后也改归省辖。高等法院院长周鸿俊（原国民党高等法院推事）、高等检察署首席检察官饶光荣（原国民党武昌地方法院推事）、汉口地方法院院长胡旭莽（原在汉口充律师）、首席检察官鲁参（原地院书记官）。

上面这班人马还几经变动，秘书长张若柏在1940年5月调任财政厅长，由贺遐昌接充秘书长，财政厅长刘泥清因为与何在税局问题上发生利害冲突去职，由张若柏接任，张在接任的次日遇刺身死，由教育厅长徐慎五接任，后又由陈维政继任（云南大理人，日本文理科大学毕业生，是当时日本军汉口特务部长落合甚九郎少将的秘书，据传他的爱人是落合的姨侄女），教育厅在徐慎五调走后由黄实光（台湾人，时充汉奸报纸汉口“大楚报”总编辑）接任，后来又由日本方面推荐何庭流（在京沪一带活动的青

年党人)接任,警务处长由日本方面推荐王达(据传是东北军军官投降日军的)接任。

从1939年底日伪省政府成立起,到1942年初何佩瑒因急病身死时,两年多期间内,何佩瑒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以下的几件事:

(一)设立厘金局,在当时日伪省府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搜刮。当时日伪省府号令所及之地,只是武昌市区和武汉附近有限的几个关卡,日伪省府一成立,马上设立了五个厘金局——美其名曰“产销营业税局”,局长吴某、魏某、李某等。有的是具有暧昧不可究诘的裙带关系的;有的是积年税棍子过去办厘金的老手。这些局名义上属于财政厅,实际上是何的心头肉。第一任财政厅长刘泥清就因为要插手分肥而为何所免去的。当时这些关卡附近并不是真正能由何控制的地方,所谓“鸡杂鸭杂”各种恶势力还多得很,设了这些局,当然添了一重剥削,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二)成立省市财政委员会。当时武汉的肥缺是盐烟两局,按国民党政府的体制说,这都不属于地方收入系统,日伪省府成立前,日伪特别市政府等于是代行了中央一级政权的职权,现在省府成立了,岂肯坐失机会。但是日本军人也早就看到这一点,把这两局拨到特别市政府的建制以外。原任盐政局长孔楚材,因为张仁蠡一系的色彩太浓,就改任日伪市府的财政局长,而由原在何佩瑒下面搞了几天省保安处副处长的李炎汉接任局长。表面上何占了一些优势,可是省府在行政上管不着盐政局,李炎汉事事听命于特务部,有了靠山就不买何的账了。这时石星川也曾活动把所谓中央税收机关暂时归参议府管辖,但石的活动力很差。参议府固然可以说是一个不省不市的中间机关,只是顾名思义,总像一个立法或咨询机关,不好管这黑白两项财源。在1942年5月间,何佩瑒和张仁蠡暂时达成一项临时协定,双方共同组设一个“省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由省财政厅长和市财政局长担任委员,委员以下分设总务、税务、收支、审核四个股,省市各派两个

股长。当然这种毫无缓冲的两头制，只会产生一连串的争执，不久这委员会就撤消，此后何和张都无法染指两局了。

(三) 企图攫取各县的伪政权。湖北省这时已有不少的县份沦于寇手——其中有许多只是县城沦陷，再加上暂时归湖北省政府管辖的江西、湖南几个县，加在一起，日伪省府的管辖区也算不小了。可是这些县的伪政权都是先于日伪省政府而产生的。省政府成立以后，这些地方就将“维持会”改称“县政府”。实际上他们一切听命于当地的日本警备队。当时一般日伪县长（如孝感朱坤宇、大冶张宜臣、江陵周仁等），都是深得日本军人欢心的当地劣绅，对何简直不买账。何费了很大的力量，掉换了一个黄陂县的日伪县长谢鹤，这才争取到别的县长对他稍稍敷衍了一下。

(四) 昙花一现的“共和党”。何佩瑒的“共和党”的秘密，已如前所述，它一直在筹备中，只是为了顾虑到南京汪精卫的关系，没有正式公开。他筹建“共和党”只是藉这名义揽权分肥而已。1940年是所谓恢复“共和党”的顶点。在汉口珞珈碑路（现珞珈山路）何的官邸内，这些内定的总裁（何本人）、副总裁（湖南政客谭道南，何心目中的华中政权成立后的湖南省长）、部长（蔡森、谢鹿萍等），日夜围着鸦片盘子在那里“建党”。何当时决定用辛亥革命后黎元洪都督府所用的旗子（即后来北洋政府所采用的陆军旗，北伐前湖北省铸造的大铜元也有这旗子的形象）为“共和党”旗，并打算将日伪省府各机关职员全部作为“共和党”基本党员。但在40年下半年，就进行得不很积极，据说是由于张仁蠡向汪精卫告密，汪又转向日方提出交涉，南京方面日本军部要武汉日本军采取慎重态度的缘故。到了1941年，这个重建“共和党”就在筹备中天折了。何当然是不甘心的。此后他还一度在“东亚联盟”这个组织上用了一些工夫。这个组织标榜着“政治独立，军事同盟，文化沟通，经济提携”四大纲领，

这都是日本人搞的无聊玩意，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何除了把“共和党”的上中层人员安插了几个在里面以外，也无法从中变出任何戏法，不久这个组织也就消声匿迹了。

（五）企图压倒张仁蠡。何佩瑢和日伪武汉市长张仁蠡的明争暗斗一直在继续着，何处心积虑想得到华中伪政权领袖地位，以便取得对张的领导权。但日军在湖南、江西两省很久不能前进，三省政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江西的地方汉奸政权中，如南昌市日伪市长万熙（留日生，娶一日本女人为妻），还时时有不服湖北省政府代管的表示。而何的得意杰作“共和党”，又因汪伪的反对，而逐渐消失下去。何的华中政权妄想，自知无法实现，他就转日向日本军方提出市政府改归省辖的意见。原来他看到日本军人当时还不愿让汪伪势力顺利地统治武汉，武汉方面假如只有一个政权，还可以搞点半独立，现在省市并立，两方之间有些关系必须有一个上一级的政权来作决定，同时还有双方互争不下的中央税收问题，这些都使南京汪伪有词可藉。何于是提出“省市府合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用省来辖市。张仁蠡看透这一点，就一反过去对汪伪不通往来的作法，而作出一些对汪输诚的姿态。张在来汉不久，曾经写信给住在北京的旧日上司傅增湘（号沅叔，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教育总长，是一个有名的藏书家。张过去曾在教育部任金事，是傅的下属），说明想在湖北刻一部丛书，请傅提出一些进行方法的意见。傅回信给他介绍汉口的藏书家徐行可，建议他就近请教，张就派参事徐海锋到徐家拜访，想看看徐家的一些精钞本。张的刻书的说法毕竟是欺世盗名的玩意，不过因此给张知道了徐家藏书中有一部清末名士文廷式所著《纯常子技语》手写稿四十册。文廷式是清末探花，珍妃的老师，原籍江西，侨居广州，汪精卫对他很推崇，张因以二千元军票向徐家买得这部手稿的抄本，送给汪祝寿，这是在1940年汪、张第一次发生联系时张所认为最得体的进见礼（汪对这项礼物极其重视，

不久就用双照楼名义刻版印行)。后来张又在日本人所许可的范围内,略略放松国民党在武汉市的活动,与汪伪社会部有关系的国民党人谢伯进也被任为武汉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样汪伪本身势力没有进入武汉前,也就对张仁蠡予以几分支持——至少在张、何关系上还是并立的。

何佩瑒在1941年下半年以后一段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如意算盘“共和党”、产销营业税等等,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眼看各县日伪政权搜刮的民脂民膏,无从问津,在日伪省府内,用人行政之权几乎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原来日伪市政府和日伪省政府除了由日本特务部作总的提线人以外,各个部门都配有日本顾问和嘱托,掌握实际权力。在日伪省府里,由于何佩瑒的昏庸,遇事逢迎日本人的意旨,这班顾问、嘱托,更是气焰万丈,例如教育厅的顾问市木,简直不把伪厅长黄实光放在眼下。秘书处的宫本,虽然地位上只是一个嘱托,也常常指挥着秘书长贺遐昌。何的嫡系只剩下一个老朽的民政厅长汪沅。还有一个建设厅长宋怀远,虽说和日本人搭上了关系,总还算是他的翻译。此外财政厅长陈维政是特务部长落合甚九郎推荐的,这人对何还很恭顺。最可恼的是宣传处长吕东荃、教育厅长何庭流、警务处长王达三人,他们都是新近由日本特务部中层当权人物由外地找来硬塞给何的。他们关系密切,行动一致,传说他们之间有个“青年党集团”,准备把日伪省府的领导权拿到手里,必要时取何而代之。何对他们心存畏忌,但又无可奈何。

为了打开何与各县之间的关系,1942年春节后不久,何“出巡”大冶,几天以后在大冶得了急病赶回武汉,很快就死了。

汪记接管湖北日伪省府

何佩瑒一死,在汪精卫方面,派什么人来充任这个遗缺,倒不是很困难的问题。他所拼凑的一副南京日伪国府的班子里,有两个

这样的人选：一是叶蓬；一是杨揆一。他们都是湖北人，都一向在湖北做官，都是军人出身，而又是长期充当参谋人员，善于搞小动作的人（叶是湖北军阀夏斗寅的参谋长，杨也曾充湖北军阀何成藩的参谋长）。杨揆一很早就走了陈璧君的门路，一等接管湖北日伪省政府的问题发生，汪就以和日本军人搞好关系为理由派杨接任。（叶蓬在1935年任汉口警备司令时期，曾经在汉口循礼门的司令部内设置日本军人形象的枪靶，经汉口日本领事提出抗议，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撤换了叶的司令职务，日本人称这为“人形事件”。沦陷后叶蓬投伪事敌。曾由汪伪在1941年派叶来武汉组设绥靖公署，但局面不能打开，不久就回南京去任汪伪陆军部长。有此一段渊源，在1942年日本军人气焰还很嚣张的时候，汪精卫也无法提出叶来接任湖北省长。）

杨揆一是在1942年三月间到武汉的，汪伪为了一新湖北人的耳目，给了他全副“仪仗”。他是省长兼省保安司令，还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又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被授权来指导省、市党部。他带来一批当厅长、局长、县长的人物准备大批出笼，可是不能带来一支军队。

汪伪原意本想把武汉方面的一切重要安排，在南京和日本侵略军总头目作出决定，但日本方面，坚持就地解决。汪精卫既然急于取得湖北地盘，也就不敢过多地讨价还价。杨揆一这次到达武汉，最重要的使命实在是代表南京汪政权和武汉日本军人进行交涉。其结果，日本军人答应了这么几点：

（一）日本军方所收编的伪军，名义上属于武汉行营管辖，用行营所给的番号。各县由日本驻军指挥的小量杂色队伍，改为保安队番号，归省保安司令部管辖，但人事权、指挥权一律照旧，行营和保安司令部事实上无权干涉。杨揆一也承认不在湖北招兵买马。

（二）各县都可以悬挂附有黄色三角飘带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旗。

(三) 对已经成立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活动范围可以稍稍放宽，但不作发展活动。当时的省党部采取常委负责制，由钱昌义、谢伯进（号盛勤）、李藩昌（号寿卿，天门人，老同盟会会员）三个常委负责。因为实际上无事可干，杨揆一也懒得去指导

（1943年以后，伪省党部就改为主任委员制，由南京伪国民党中委、当时的日伪湖北省教育厅长黄大中任主任委员，但同样是无事可做）。各县也一律在日伪县长的领导下，挂起县党部的招牌

（有些县就由日伪县长兼任县党部主任委员，不问那些县长是否具有国民党党籍）。

(四) 财政方面，还是在南京由周佛海通过日本派来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顾问交涉的。关于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分行的设立和储备券的流通，本是出于日本人本身的计划，所以进行很顺利。以汉口为中心的盐烟专卖和统税收入，也纳入中央税收系统，由伪财政部派一个鄂赣湘三省财政特派员驻在武汉（特派员王震生，特派员公署设在汉口黄陂路）。但关于盐烟统三局的人事和行政，实际上还是日本特务部直接管辖，所谓特派员公署，只不过是一个记帐和分取一部赃款的机构而已。

(五) 对于省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县县长的人选，日本军方原则上承认由省长决定，但应和特务部协商，县长还应经过特务部征得当地日本驻军的同意。如果驻军推荐新县长，也须经过省政府同意后发表。

(六) 原来从特别市政府成立直到何佩蓉的湖北省政府每个厅局，都有一个顾问和嘱托，顾问实际上是这个机关的太上厅局长，有些机关竟至于一切重要公文都要经过顾问同意盖章，才能生效，这样使得那些厅局长有时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杨揆一对于这些七手八脚的提线人，也感到难于应付。经过多次交涉，日本人算是答应了取消顾问一级，只保留若干嘱托，算是中国政府

聘用人员。这些嘱托的职权，一般也只限于提出意见，通风报信等。此后对市政府也同样取消了顾问，而由特务部的第一课长担任省、市政府的总顾问。

日伪省府的日本顾问虽然取消了，可是日本军人的权威仍然是高于一切。例如，1943年间，日本侵略军曾经统一制定了当时各县日伪县政府应拨交当地日本驻军的粮秣数量，以前这本是由驻军分别直接命令伪地方机关照缴。这一年根据杨揆一代表汪伪中央和汉口日本特务部事先交涉的结果，这一类重要事项都应经由特务部向日伪省政府提出再分令各县照办。特务部就派人持密件要省政府立即转令各县。杨揆一对这事很感为难。立即照办吧，似乎毫无代价地替人负下这么大的责任，有些犯不着，不予照办吧，又会被日本人认为没有合作的诚意。时间紧迫，没有向汪伪请示或进行研究磋商的余裕。杨揆一只得把特务部的来文交给秘书长吴明浩去办。吴明浩当时不愿负这责仝，就建议交财政厅办理。因为财政厅长陈维政是人所共知的日方推荐人员，交给他就推卸南京派的责任，同时也是对日本军人的要求“欣然同意”的表示。陈维政当然也知道杨的用意，但他还是接受了，他吩咐管理赋税的第二科长李永祯拟办通令各县的文稿，李说这是特交文件，并不属该科职掌范围，他要四个科长共同负责。后来别的科长都认为这到与民政厅的职掌有关，陈因此向杨说明，财政厅可以奉令拟稿，但希望民政厅会同办理，结果由财政厅第二科科员夏某到秘书处去办稿，由秘书处负责转发，（因为是密件，所以拟稿直到缮发都集中一处办理）稿面上主管科一栏盖上了民财两厅全部科长的八个名章，厅长一栏盖上汪书诚和陈维政两人的章子，吴明浩也以秘书长的地位核稿盖章，杨揆一当然不能不划行。事后吴明浩叮嘱秘书处把来文和会稿一起封存，在封面上亲批“绝密！此卷非经秘书长核准，不得调阅”。他们用了许多气力，好像做了一件大事似的，可是事实上各县的日本驻军

早已直接命令当地的汉奸政权照办，完全用不着杨揆一的马后炮。以后日军对于这类事项，就干脆不再通过日伪省政府，杨揆一也不再强调他的发号施令之权了。

杨揆一的大杂烩

杨揆一上任后，在人事上发表秘书长蒋镇东（日语翻译），民政厅长汪书诚（湖北老官僚），建设厅长关麟书（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湖北荆州驻防旗人，和杨同是何成濬部下军官，曾任行政专员），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张某（北方人，经历不详），经理处长是何成濬的外甥吕渭村（杨以前长期任何成濬的参谋长，这次重用吕某是藉以和何成濬保持联系）。原来由日本方面关系到省政府的财政厅长陈维政、教育厅长何庭楨、宣传处长吕东荃、警务处长王达都留任原职。在武昌设有一个市政处，处长是刘立藩（湖北旧军阀刘佐龙之子，日本士官生），也是日方关系而由财政厅科长外调任职的。

杨为人贪财好色，生活腐化到了极点，他过去曾诱骗外甥女为妾，他的外甥凌德源就因这双重关系而一直受到重用，这次随着来汉，位置是行营经理处长，当时摆出一些炙手可热的威风。一到汉口就因在当时汉口的所谓“交际花”华香琳那里争风吃醋和杨的秘书长蒋镇东发生冲突。凌借故向杨告了蒋镇东一状，杨就斥责了蒋一顿。蒋在一上任的时候，就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只好辞职回南京。投奔到杨的敌人叶蓬那儿去了。这事在南京传开了，伪府中人对杨颇多不满。杨除了陈璧君那条路子以外，在南京别无其他有力的奥援了，即使陈璧君对杨也只是交易关系。尽管杨的姨太太（凌德源之妹，即杨的外甥女，）拜结陈璧君作干女儿，陈也并不把杨看作死党。杨为了打开出路，只好一面授意凌德源辞职离开湖北，一面电请汪伪另派秘书长。这样南京方面就派了鄂籍的伪立法委员吴明浩来接任蒋镇东退下的秘书长职

务，算是把这一场风波平息下去。

当时日伪省府方面有几个由日本关系而留任下来的厅处长。其中财政厅长陈维政入地生疏，野心不大，对杨还表示恭顺。至于宣传处长吕东荃、警务处长王达和教育厅长何庭流却结成一个“小集团”，一般人称他们为“青年党”一系（实际上只何庭流是青年党人），他们和特务部中中层以下的日本人勾结得较密，总想伺机而动取代杨揆一。因为陈维政不和他们一致行动，所以首先想夺取财政厅长的职位（吕东荃在来湖北以前，曾任日伪河南省府的财政厅长）。碰巧1942年夏天，财政厅内发生了一笔科员罗某的伪造支付命令盗窃四万余军票的案件，盗窃未遂，就被破获了。吕东荃等就对陈维政等大肆攻击，但是陈因和日本特务部前任部长落合甚九郎的关系很深（这时落合甚九郎调任旅团长，后来兵败死于湖南，曾将陈托给继任的落合鼎五），同时他在日伪财政厅也根本没有嫡系的私人来任用，这次案件很容易证明和他并无什么特别牵连，只是由于制度不严，主管科长刘纯伯失察而已，因此陈的地位并未动摇。杨揆一看到陈很恭顺，正好利用他来打击吕东荃一系。吕、王、何这一小集团，形势渐转不利，不久又发生王达逃跑的事（王逃后很久，又曾大摇大摆在武汉出现，但和日伪省政府就没有联系），吕、何两人就不安于位了。杨后来示意要撤销宣传处，陈维政从减少经费的见地上加以赞同，于是吕东荃就辞职离鄂，何庭流也随而去职。南京方面又派黄大中接任教育厅长，宣传处结果并未撤销，由日伪中央电讯社的殷再纬接任处长。从外表看，南京派的声势壮大起来了，可是实际上他们都没有什么权力，只不过各人抓住一个名义，作为贪污的地盘罢了。

在王达离开警务处之后，日方提出以在抗战中兵败被俘经汪伪劝降的蒋军杂牌军长公秉藩继任日伪警务处长。汪伪这时正在大事搜罗重庆军人，当然极力赞成，杨揆一也只好欣然同意，公

担任这个光杆处长，倒是自甘庸碌，不求表现，对杨也做到适可而止的恭顺，杨很想藉他和蒋军杂牌部队中的孙蔚如（时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公和孙同是陕西人）拉上关系，因此极力拉拢，彼此很能相安。

杨到湖北来没有带来一兵一卒，他兼任行营主任当然仅存空名，行营所辖的所谓“国军”，只是由日本军部所豢养的一些由所谓“皇协军”改编过来的土匪流氓——说是改编，实在不够确切，事实上在伪军本身，甚至连名称都不曾改，只是在某些必要的场合，才使用行营安排的番号。这些伪军为第×师第×师，实际上是人少枪缺的一些乌合之众，其中以邹平凡部略具实力。邹部原称黄卫军，本是由熊剑东编成的，熊是戴笠一系在江南的特务部队将领，被日军俘虏后投降日军，很受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八木中佐的重视。不久熊剑东调走后，由其参谋长邹平凡接管他的军队。

杨揆一卖官鬻爵

杨揆一看到当时湖北沦陷区内各县的日伪县长，靠着卖盐卖鸦片和物资统制，大发横财，他就想从这些县长身上开辟财源。杨的办法是：（一）利用另一争夺县长的人所发动的控告，向特务部提出更换县长的要求。不用说这些控告的内容都是事实，日本军人浪人虽然可以继续庇护着这些日伪县长，但时候一久，也觉得理由不很充足，往往示意这些日伪县长“私休”。（二）有时各县要换县长，杨这时就运用他的同意权，这个新县长就必须取得日本军方和杨揆一两方面的认可，才能上任。由他发放订下分肥条件的有黄冈县长罗荣袞（号薛裳，北洋军阀时期做过夏口县长，罗后来转任伪武昌县长），黄陂县长陶敦礼（号聘三，后来接罗荣袞任日伪武昌县长），黄陂县长程汉卿，监利县长李孝怀等人。还有沔北县长曹彦，是特务部的翻译，也是先走日本人

的路子后取得杨的同意发表的(当时沔阳划为沔北、沔南两县)。

杨揆一长年住在汉口怡和村“省长官邸”里，陪着自己的姨太太以及别人的姨太太打牌，每一个月到武昌省政府去三、四次，算是点点卯，一切卖“官”鬻“爵”的要公，都在官邸里进行。

他还异想天开，利用“县政会议”的名义常常召集各日伪县长来武昌开会，题目是“治安”、“财政”，各县的县长决不能不来(因为这些题目是合乎日本的国策的)。既然来了，就不能不对杨孝敬一番。

要想分县长的肥，最好是能掌握县长的任免之权。在杨当日伪省长的三年中间，也曾经更换过有限的几个县长。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三番五次向特务部提出，才得到同意的。也有个别的是先走好日本人的路子，然后在杨那里许上愿，这样就更快一点。

除杨以外，秘书长吴明浩和民政厅长汪书城也是想在县长身上分点肥的，他们对杨的包干办法当然不满。杨对于汪书城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但对吴明浩开始却不能不让几分，因为吴虽然说也没有很可靠的后台，可是毕竟是南京来的。在蒋镇东去职以后，假如再容不下吴明浩，将使得南京方面的反对者更多一层理由。后来杨、吴交恶愈趋尖锐，终于由杨从南京带来的秘书主任章志荪和吴发生冲突，吴一怒而回南京，从此杨在南京方面又多一个仇人了。

吴明浩与杨揆一交恶的导火线表面上是章志荪，实际上在很久以前，杨的亲信和走了杨的门路的一些县长，都不买吴的账，吴因此常在公文上挑眼，可是最后的阅审决定之权却在杨手上，杨常常作些模棱两可的圆滑批语抹煞了吴的意见。尽管这样，对杨还是有些不便，后来有几次杨采取把“省长亲启”的文件批好了再交秘书处去办稿，又决定一般文件由秘书主任章志荪先签注意见来消除吴作为秘书长的权力，引起了吴很大的反感。

建设厅长吴麟书和杨同是何成藩属下的旧同事，关系原来不

浅，但由于建设厅多少管着一点生财之道，因这就和杨还是发生冲突，杨后来从南京找来了陈承纶来接替他，陈资历不深，后台不硬，就只好遇事受杨摆布。

事实上杨这时已经和他带来的一班党羽，因权利冲突而分开了，这时原非嫡系的陈维政却和杨关系处得极好。陈处世接物，一向是圆滑谨慎，对杨更是恭顺，在杨和特务部的往来中，陈是处于译员和代表的地位，他对钱财方面比较淡漠，并不利用这种机会要求分肥，他似乎忠实于双方。起先杨对他也不那么放心，曾经特地从南京找来一个日本话说得极好的翻译蔡文石来当秘书（后来当经济局长），但蔡很轻佻，在日本人方面不能比陈维政取得更多的信任，因此杨不得不依旧借重陈维政。时间久了，他对陈比较对他原来的一些嫡系，反要信任得多。当然这主要是由于陈从不插手于杨的财源的缘故。在1944年杨揆一决定把秘书处和民政厅合并，改称政务厅，以陈维政兼厅长，这样陈就更加感激图报，而杨在出卖县缺的重大利益上一举而消除了两个可能分肥的人，此外由南京安插来的警务处长公秉藩也因同样的谨小慎微，赢得了杨的相当信任。

杨揆一同陈维政的勾搭

随着日军战事失利，沦陷区通货膨胀的现象突出的显现出来了，日伪省政府是个高高在上的空头机关，本身没有收入，只靠“所谓中央补助费”来维持开支。这种补助费是每半年（当时的预算是一年制订一次的）作一次调整决定。由于伪中央储备券贬值非常厉害，这笔补助在决定以后的三、四个月就不值多少了。而在此以前，日伪省府增设了一些机关，像经济局（局长蔡文石）、粮食局（局长胡瀛洲）、清乡事务局（局长王遇甲）、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谢伯进）等，虽说大都只是一些有名无实的机构，可是也毕竟要一些人事费用。在通货贬值以后，